

新时期的

发展与思考

——南京市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集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南京中共党史学会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新时期的发展与思考

——南京市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集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南京中共党史学会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新时期的发展与思考

——南京市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集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南京中共党史学会

南京空军机关印刷厂

南京唐权鑫图文印务中心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235 千字

2008 年 11 月 印数 1-300 册

苏出准印(2008)字 JSE-1002357

《新时期的发展与思考——南京市党史系统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任:陈绍泽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为序)

庄小军 刘建国 刘喜发 吴凤照 陈丽君

孟国祥 戚建国 蒋晓星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瑞林 毛德松 卞建农 朱宝兰 邹元岱

巫永发 苗 生 周国平 张殿林 陈 冲

陈德勇 杨恒林 栾 震 郭智林

主 编:陈丽君

副 主 编:安 丽

执行主编:徐 彦

工作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维瑜 安 丽 张 弘 徐 彦 陶 宁

封面设计:邢路宁

前 言

在纪念伟大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由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中共党史学会联合编纂的《新时期的发展与思考——南京市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正式出版了。这是南京市党史系统在党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

《文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立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南京的伟大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从理论与研究、实践与探索、回顾与展望三个方面,反映了中共南京市委和南京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新实践,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南京面貌的历史性变化,进一步深化了对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深化了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的认识,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深远历史意义的认识,更加增强了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加增强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文集》集聚了全市党史学界专家、学者的智慧,体现了南京市党史理论研究水平,对做好党史资政育人工作具有促进作用和

指导意义。我们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切实加强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充分发挥南京党史资源优势,进一步强化党史宣传教育功能,进一步提升党史资政育人水平,用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激励人民,用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教育人民,为推动南京在新一轮发展中走在前列服务,为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服务。

目 录

前言	(1)
----------	-----

理论与研究篇

牢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的特点及其启示	张寿春(1)
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定位问题	刘喜发(16)
勇于突破 解放思想的凝炼精神和行为模式	蒋晓星(31)
对党在建国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陈丽君 吴光祥(41)
实践呼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与根据分析	王西庆(58)
论科学发展观的世界性特征	周贤山(6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周期性 ——兼论对思想解放的内在要求	张家芳(77)

- 邓小平领导的我军四次精简整编和百万大裁军述评
..... 胡明华(86)
-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
..... 秦淮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联合课题组(112)
-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
..... 黄福东(121)
-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 蔡继龙(128)
- 浅谈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
..... 陈宁华(134)
- 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新成果
——以中共四代领导集体发展观的历史演进为考察对象
..... 吴爱惠(141)
- 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 张兴中(150)
- 小康社会
——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
..... 李文萍(157)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解放路线图探析
..... 李富慧 祁金燕(168)

实践与探索篇

- 发挥优势 履职尽责 促进玄武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 梁广宏(175)
- 新时期城市社区党组织工作着力点研究
——秦淮区“四位一体”社区管理模式的实践及前景
..... 王小建(181)

积极稳妥推进下岗保障向失业保障并轨工作	
..... 安 丽 朱南平 陈 伟	(192)
南京市“科技功臣奖”“十大科技之星”的评选与影响	
..... 徐 彦 姚建虎 马维瑜 项毓福	(210)
“民办法庭”为南京和谐撑起一片天	
..... 冯新章	(221)
浅谈南京市鼓楼区新时期城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 周国平	(230)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以人为本	
..... 邹元岱	(239)
南京市建邺区新型社区中心建设的实践思考	
..... 陈德勇	(247)
从马集镇巨变看改革开放的强大生命力	
..... 霍德明	(255)
解放思想,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从中央机关公务车停驶 50% 想到的	
..... 李福松	(262)
服务外包与南京产业结构的升级	
..... 陈英武	(268)
三十年改革开放与农民思想的转变	
..... 丁健民	(283)

回顾与展望篇

小芦蒿创出大市场	
..... 张玉凤 曹德强	(289)
“小草”俱乐部里看幸福晚年	
..... 汪顺培	(304)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我的成长道路	余栋华(309)
三十年梦想成真	梁 军(315)
从出差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蔡 敏(320)
台下台上	吴迪明(323)
记得小时候	杨慧慧(325)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巨变	沈 超(328)
从抗震救灾看改革开放三十年	陈觉之(331)
危难之时更显我军本色	张 海(334)
我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吴晓戈(337)

牢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 历史转折的特点及其启示

张寿春

摘要: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同危害已久的“左”倾指导方针的决裂,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全面进行拨乱反正,不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转折。随后30年来改革开放的新成就,更加证明这次会议的确是摆脱困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决定性环节。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转折;改革开放;实践检验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发生某些失误和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也不例外,同样是一再呈现出“之”字形的曲折历程。而每一次从失败或严重挫折到获得新胜利的历史性转变过程,都必须有一个重新拨正方向道路的转折点。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①,就在于这次转折有着四个鲜明的特点。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一、规范性——把全党工作重点从抓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社会主义阶段政治路线的惟一准绳

政治路线是党的行动纲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的工作重点抓什么,决不是一般性的工作安排,而是事关全局的政治路线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果断地否定了多年来占支配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明确规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①,标志着重新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

首先,这次决策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关于不同阶段历史任务转变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重要文献中,早就论述过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不同阶段是各有侧重的:第一步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第二步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并且通过没收或赎买的办法,把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改造成公有制,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第三步是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到首要位置,尽快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并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对照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一步的任务在1949年就已完成;第二步的任务在1956年也已完成;余下的第三步任务,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我国则尤为迫切,也特别繁重,更应集中力量去解决。

可是,我们党长时间被一种僵化的观点所支配,认为政治路线只是讲怎样分析阶级关系和处理阶级斗争。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须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归根到底是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不能和阶级斗争划等号。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由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经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济利益存在尖锐的矛盾,必然要发生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并且集中表现为争夺统治权的政治斗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当然应集中表现在怎样分清敌友这个首要问题上,根据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处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关系。但是,政治路线的完整内涵,指的是党在一定时间内总的政治任务和政治主张,它既要指明全党全国人民在这个阶段的奋斗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又要规定实现目标的基本方针和途径。因此,政治路线的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的,而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部署,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把处理阶级斗争当作政治路线的永恒主题,显然是错误的。

其次,这个决策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的迫切需要。

早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就明确指出:由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几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①这里所说的三个“已经”清楚地表明,原来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资本家都因丧失赖以剥削他人的生产资料而不复存在,社会主要矛盾也就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相反,“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却明显突出起来。因此,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②。八大的这些正确论断,实际上已经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3页。

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4页。

到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后,周恩来又把建立“工业国”的目标扩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强调“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①。这个新概括更加准确地表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现代化是新中国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双重任务,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现代化建设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必须把两个方面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才能真正建设起一个屹立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强大国家。

但是,由于“三大改造”改变了原定计划,党对提前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以及后来对形势估量的失误,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贯彻。相反,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左”的错误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各项工作都要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文革”期间更把八大的正确决策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文革”结束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等人虽然主张经济建设要“大干快上”,然而由于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抓纲”才能“治国”,以致陷入了徘徊前进的被动局面。这些教训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把一心一意搞“四化”作为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恢复和发展八大正确路线的迫切需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认识到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与党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的一致性,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

二、开拓性——把拨乱反正与改革创新相结合， 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重大突破

实现拨乱反正只是我国探索建设道路遭到严重挫折带来的一项特殊任务，最终目的是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顺应这种历史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这次全会在重新决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重要原则。

其一，经济体制必须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进行改革。

新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进行现代化建设，力争尽快地缩短比发达国家起步晚了二三百年的历史性差距，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由于建国初期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得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模式，以及受革命根据地时期某些经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集中统一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统一国家财政和稳定市场物价，对于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用来进行重点建设，对于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保证对私改造的胜利完成，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中央集权过多和政府对企业管得过死等弊病。后来虽然进行过一些调整和改革，也只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围绕着放权还是收权几经反复，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这个模式。以致长期缺乏市场观念和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过多地依赖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指挥生产，限制了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鉴于这种经济体制的消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①这一段重要论述突破了把革命始终局限于进行阶级斗争的僵化观念,而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提到“革命”的高度,不仅坚持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从总体上规定了各项改革都必须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后来大规模地进行改革无疑是提供了根本性的正确指导方针。

其二,改革经济体制必须有利于发挥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为了纠正我国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应该在坚持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把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并且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重把思想政治工作 and 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应该切实改变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并且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这些规定,实际上是要从过去那种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的办法转变为间接的宏观调控的体制,把责、权、利三者统一起来。会议认为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其三,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必须切实做到综合平衡。

经济建设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力求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是1956年党的八大充分肯定的正确方针。可是,毛泽东着重强调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事物发展不平衡的绝对性,在1958年轻率发动“大跃进”运动,以为工业“以钢为纲”,会带动国民经济万马奔腾,结果却是挤掉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导致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国民收入减少1200亿元。再加上同时期轻率发动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使全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更大影响,甚至出现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随后错误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持续十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又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以上两次由于决策失误的大折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建国头30年的总投资。“文革”结束后,又兴起了新一轮急于求成的热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审议了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严肃地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交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对于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会议通过的《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还提出,一定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这些正确主张,同样体现了改革的精神,对于及时制止求成过急、引进过多的“洋冒进”是一副非常重要的清醒剂。在这个基础上,党中央在第二年4月进一步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重申必须按照综合平衡的原则,确保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安排,才能使国民经济既有高速度又能稳定地向前发展,以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综合平衡是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

其四,加快发展农业必须多方面调整农村政策。